

红军长征在贵州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指出,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如果把长征比作一条红飘带,那么贵州在这条红飘带上留下的色彩最为厚重,红色也成为“多彩贵州”最亮丽的颜色。当年,中央红军在贵州转战历时4个多月,红二、红六军团征战贵州3个月,其间都经历了什么?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调集重兵,层层围堵。在前有埋伏、后有追兵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1934年12月中旬,红军进入贵州,占取黎平。在转战贵州4个月的时间里,党中央先后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会上毛泽东

正确分析敌我形势,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引领和推动全党作出重大决策。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明确了转兵贵州的方向。尤其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谈到有人在遵义会议上批评他,说他打仗的方法并不高明,“是按照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对此,毛泽东说:“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打仗不能照抄书本,领导革命更不能生搬硬套。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能给中国革命带来损失,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正确道路。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

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毛泽东后来指出,“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1935年2月初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对遵义会议决策进行再落实,同时根据敌我形势的变化,指示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改变以前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3月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正确分析战场发展态势,研判敌我双方实力,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固守之敌。但在民主表决时,只有毛泽东自己投了反对票。当天深夜,毛泽东手提马灯,去找周恩来做了深入沟通,加之截获的敌人电报显示他们正在迅速向打鼓新场集结,意图围歼红军。最终中央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有效保存了红军实力。

取得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娄山关大捷

贵州关山阻隔,处处艰险,加上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困,红军每前进一步都极为不易。但正如毛泽东诗云:“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正是这种不畏艰难、英勇向前的豪迈气概保证红军在贵州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娄山关大捷。

遵义会议之前,为了保证会议顺利召开,红军曾攻占过黔北咽喉娄山关。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决定向北到四川和陕西四方面军会合,但遭到敌军的阻截,红军遂西渡赤水,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云南扎西集结,但敌军再次追迫,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为迅速摆脱敌人追击,1935年2月,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接到“消灭娄山关黔敌夺取遵义”的命令。他身先士卒,指挥将士们英勇顽强冲杀,最终击溃了敌军,取得娄山关大捷,重占遵义。彭德怀曾对刘奇少说,敌人是“上午八、九时从遵义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十一时许,红三军团才接到军委要求袭击遵义的命令,“即

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我先头部队到娄山关分水线(制高点)时,王家烈部队只隔两三百米”。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诗句,大气磅礴,穿越时空,凝聚起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断由胜利走向胜利。

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在国民党苛捐杂税压榨和军阀蹂躏下,贵州人民的生活极度困苦。贫穷的贵州百姓自称“干人”,红军进入贵州境内后,总司令朱德亲自向中央警卫团的干部战士作报告,反复强调执行民族政策的重要性。他指出:贵州少数民族多,他们受压迫最深,生活最苦,是红军的依靠力量。各少数民族礼俗不尽相同,我们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要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军阀。

1936年3月,红二军团一部行军至威宁兴隆厂一带,这里是苗族聚居的村寨。红军离开后,之前因不了解红军而逃离的群众返回村寨,发现不仅各家各户的东西都完好无损,而且还在罗伯亚米家里发现了一碗当地人从未见过的红色小豆。时逢春耕季节,他们便拿到地里种下,到了秋天获得好收成。年复一年,当地种豆者越来越多。因为小豆是红军送的,为了记住这支纪律严明、作风优良的队伍,当地苗族群众称其为“红军豆”。除了“红军豆”,贵州其他地方的群众还把掩埋着红军烈士的土塚称为“红军坟”,把红军留下的战马称为“红军马”,把红军送给的马灯称为“红军灯”。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红军长征中的贵州得到了生动反映和集中展示。

(源自人民网)



辛亥革命前10年间,以留日学生为译介主体的新思潮的传播形成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第一波浪潮。辛亥革命后,当民国肇建初期的政治纷扰告一段落,中国思想界谈论社会主义的声音又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一)

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主义总部发表题为《社会主义之发生与派别》的演说,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著作《资本论》的贡献。他在演说中指出,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奈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孙中山乐观地预言:“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

在孙中山的积极倡导和影响下,谈论和研究社会主义曾经风靡一时。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出版《社会星》《社会党月刊》《新世界》等多种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多有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中国社会主义支部出版的《新世界》半月刊,在1912年5月至7月连载施仁荣翻译的《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二节和第三节的部分内容,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中文节译。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曾经提及此事。他说:“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12年6月,《新世界》第2期刊登了朱执信译述、煮生整理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称赞《共产党宣言》“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

除了孙中山和江亢虎,民国初年高谈社会主义的人士和刊物也不在少数。

(二)

1915年,以《青年杂志》(第2卷起更名为《新青年》)的创办为标志,中国思想界开始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为各种新思潮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1917年11月,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爆发,中国的许多报刊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进行了报道和评论。1918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关于欧战的演说稿《庶民的胜利》和专文《Bolshevism的胜利》。在《庶民的胜利》中,李大钊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劳工主义的胜利。他预言:“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这让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依靠力量。

五四运动前夕,国内出版的报刊上开始出现专门介绍马克思生平和学说的文章。此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大都是在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和文章中被提到,很少有专文介绍。1919年4月1日至4日,北京的《晨报》副刊发表《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一文(《新青年》第6卷第5号予以转载)。作者渊泉(即陈博贤)开篇即表明,他向读者介绍“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的奋斗生涯,有两大用意,一是为了引起人们研究社会主义的兴趣,二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古来贤哲”献身求学的奋斗生涯。

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在“名著”栏发表成舍我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译文摘译第二章中的十大纲领。译者指出:“这个宣言,是Marx和Engels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

(三)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为各类新思潮的传播打开了闸门,各种新创办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开始多了起来。1919年5月5日至8日,渊泉翻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晨报》副刊《觉悟》连载,《新青年》第6卷第5号予以转载。这是一篇译自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文章。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学理上,有两大根源。其一是历史观,其二是经济学”。文章依据《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系统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1919年5月(实际出版是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了李大钊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刘爽麟的《马克思传略》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同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还刊载了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录自《新中国》)、渊泉的《马克思奋斗的生涯》(录自《晨报》)等文章。

除了《新青年》和《晨报》副刊,五四时期的其他著名刊物,如《国民》杂志、《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建设》杂志、《共产党》月刊等,也发表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许多译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章发表。1919年11月至12月出版的《广东中华新报》,发表了杨德安的《马克思主义(一种科学社会主义)》一文,文中说:“马氏以唯物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开始多了起来,但那时,人们能够看到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还不多。李达回忆说:“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过来,我们只是从日文上看到一些。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都翻不了。”只有到了1921年前后,当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的大潮才真正开始涌动起来。

(源自人民网)

从辛亥到五四：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毛泽东写给雷经天的一封亲笔信

1937年10月5日晚,随着两声枪响,陕北公学16岁的女学员刘茜倒在了血泊中。行凶者抗大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竟残忍地枪杀了他所追求的恋爱对象,使自己由革命功臣沦为杀人犯。这就是当时震惊陕甘宁边区,影响波及国统区的“黄克功案件”。黄克功被捕后,也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对他从轻处罚。据毛泽东当时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回忆,他就曾收过黄克功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写给毛泽东的信。黄克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承认自己的罪行,请毛主席定夺;雷经天在给毛泽东的信上虽未直言他不主张杀黄克功,但在字里行间确实流露出很惋惜、要给黄克功一条生路的想法。

陕北公审黄克功

案发6天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及高等法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0月11日在被害者所在单位——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会,对黄克功进行公开审判。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亲临现场。出席公审大会的还有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副主任胡耀邦、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处长黄左超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担任刑庭审判员,高等法院检察官徐世奎是公诉人,袁平、任扶中是书记员,抗大、陕北公学群众选出的李培南、王惠子、周一明、沈新发等四位同志为

陪审员。

在陪审员、审判员、公诉人、公诉人、证人、辩护人进入会场后,雷经天宣布开庭。公诉人和公诉人先向大会陈述了黄克功案件的全部细节,指出:黄克功对刘茜实系求婚未遂以致枪杀革命青年,在黄克功的主观上属强迫求婚,自私自利无以复加。黄克功曾是共产党员,又是抗大干部,不顾革命利益,危害边区法令,损害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实质上无异于帮助日本汉奸破坏革命,应严肃革命的纪律,处以死刑,特提向法院公判。

雷经天让黄克功发表个人陈述时,黄克功用从容流畅的语言,毫不隐讳地向法庭陈述了他的简历,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并且作了扼要的检讨。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他提出的惟一的“理由”,只是认为“刘茜破坏婚约是侮辱革命军人”。他的声音虽然不高,但整个会场却能听得清清楚楚。当审判员特意问他“在哪些战斗中受过伤,挂过彩”时,他敞开了衬衣,指着从臂膀到腿部一块接一块的伤疤,历数了许多战斗过的大名。当审判员问他还有什么请求时,他说:“如果死刑必须执行,我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不死在自己人的法场上。如果允许,他要求给他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死在向敌人的冲杀中,如果不合刑律那就算了。”

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罪犯,是曾

为革命多次负伤流血而作出很大贡献的功臣,不少人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尤其是一些身经百战的红军老干部甚至痛哭流涕,场面极其悲壮,一时令观者不忍目睹。

现场宣读毛泽东来信

就在黄克功走到会场边时,只见一匹快马向会场飞奔而来。毛泽东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翻身下马,径直向雷经天走去。雷经天起身接过那位工作人员递给他的一个信封。主席台上立即传出声音:“信,毛主席的信!”那声音很小,很快,但“毛主席的信”像风一般传遍会场。黄克功在会场边也听到了,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停住了脚步——他比任何人都关心这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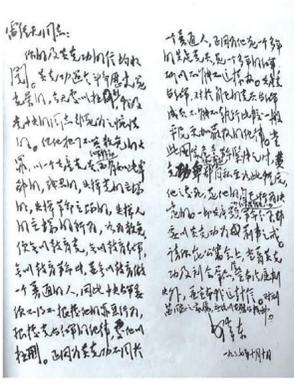
这封信是毛泽东于10月10日夜写好给雷经天的,以答复雷经天和黄克功给他的信。本来想让参加会议的张闻天带去雷经天的,可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休息时忘了交代秘书,所以才在午后派人飞马送到会场。

随着莫文骅的声音停止,大家再将目光转向黄克功时,他才如梦一般醒来,高高扬起头,看了看蓝天、白云。

“黄克功案”处理后,毛泽东还在抗大特意作了一场“革命与恋爱”的讲演,提出了革命青年在恋爱时应遵循的“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和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他要求大家从“黄克功

案”中吸取教训,要严肃对待恋爱、婚姻、家庭问题,要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和情操,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到此事,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欺压群众是万万要不得的。

(源自人民网)



毛泽东就黄克功案写给雷经天的信

百年大党赓续千年文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回首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锚定奋斗目标,团结和带领中华儿女开创出无数光辉业绩,铸就百年辉煌,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更离不开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指导下对传统文化的合理继承与大力弘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底色。中国古代有着悠远的以民为本、重视民心向背的优秀文化传统。先秦时期,孟子即已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也以“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比喻警醒统治者重视民心向背对于政权稳固的根本性作用。与封建社会士大夫劝谏统治者重视民力、维护君主专制的封建统治代代延续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

主义政党,创造性地继承并发展了传统“以民为本”思想的价值内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带领人民真正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党还将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这无疑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所具有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古语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应当刚毅坚卓,力求进步,一个伟大成熟的政党亦应如是。正是继承并弘扬了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百年以来才有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抛洒热血、毁家纾难,才有克服千难万险也要抵达彼岸的英雄气概。正是继承并弘扬了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华民族冲

破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创造铭刻史册的辉煌。

同时,面对当今纷繁复杂、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沉溺于既有成就,还必须保有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古人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乱。”居安思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

和平发展、携手共进的文明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启迪我们,任何试图称王称霸者皆不得人心,最终难逃失败的结局。只有真正从全人类福祉出发,追求与其他国家互惠互利,共同繁荣发展,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才能真正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基于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休戚与共的客观现实,又蕴含着中国古语代先民“以和为贵”智慧所涵养出的和平发展、求同存异、携手共进的发展观念。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民

族一向奉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观。中国始终坚定构建互利合作格局,承担国际责任义务,而不是以邻为壑、损人利己。中国梦的实现既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中国也时刻展现着大国担当,在世界范围内求得理解与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一篇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伟大宣言,再次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化的复兴者,是中华文明的守护者、传承者、发展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这一历史契机,赓续5000年悠久文脉,守护好建设好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以“两个”为针,激活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新的风采。同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水平,不断铸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辉煌,从而揭示出中国道路、中国文化价值对于世界发展的普遍性意义。

(源自人民网)